

彭自强 著

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

——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

儒道释
博士论文
丛书



巴蜀书社

◎ 俗文化語彙

地教也教道教的冲教也教有
余教也教有冲教也教有

—— 五十年代香港流行語

香港社會語言學



彭自强 著

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

——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 / 彭自强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8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7-80659-090-0

I. 佛... II. 彭... III. ①宗教-研究-中国-汉代②
宗教-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4015 号

责任编辑: 李卫红

封面设计: 张光明

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

——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

彭自强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

成都机场路月亮湾体育中心侧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10 千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59-090-0/B·14

定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缘起

儒道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采。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博士点，使年轻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轨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新生力量，是有关各学科未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后，已在国内外的同行学者中受到了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学术著作的出版甚难，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难以及时发表。不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

不利，且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也不利。我们有志于解决此一难题久矣，始终均以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近与香港圆玄学院商议，喜得该院慨然允诺捐资赞助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本丛书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征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释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皆属本丛书的出版范围，均可向本丛书的编委会提出出版申请。

本丛书的编委会是由各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审定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入选工作。我们掌握的入选条件是：（1）对有关学科带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向前发展的；（3）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的。凡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入选。但我们对入选论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文章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须有科学的依据，应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详细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我们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年轻学者中倡导一种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

由于编委会学识水平有限和经验与人力的不足，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各有关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加强联系和合作，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的书稿，让我们一道为搞好《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的出版工作、为繁荣祖国的

学术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1999年8月5日

序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大力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有三个要点：一是深入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的外延与内涵、结构与功能、精华与糟粕；二是准确了解和掌握现代化的条件与要求、内容与特点、过程与趋势；三是在上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着重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批判与继承、重整与革新、综合与创造。作为三个要点之一的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而探讨儒、道、佛三家的关系又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和艰难的任务。

自东汉以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说为主导、以道家学说（含道教）和佛家学说为辅助的三家互动互补的格局。从三家思想文化的内容结构来看，儒家侧重于政治伦理学说，道家崇尚天道自然，佛家则侧重人的宗教修持与解脱。可以说，儒、道、佛三家分别贡献了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三个原则，为人们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几个基本关系提供了深邃智慧和行为准则，此即后世所称儒、

道、佛分别治世、治身、治心之说也。佛家学说与儒、道学说有相同、相似的一面，也有相异、相殊的一面。佛家附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与规范，吸取道家的有无观念与自然主义思想，且又对人类的精神世界领域的终极关切——生死大事，阐发了独特的视野与理路，论述了人生哲学（含死亡哲学），为人类安顿死亡、解脱人生痛苦，指出了别开生面的途径。这都为佛家与儒、道两家互动互补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背景与理论机制。

从中国文化的生存、发展来看，儒、道、佛三者的关系涉及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出世文化与入世文化等一系列不同文化的类型、思想、内容、风格的交涉。这种异质文化的互相冲突、互相融会，构成中国古代绚丽灿烂的文化图景。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的共存共荣，既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进步。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文化交流是一件好事。文化交流就是文化比较，就是文化选择，也就是文化进步、文化发展。

从中国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来看，我个人认为有三条根本性的历史经验：一是与中国现实社会相适应，尤其是与现实政治相协调；二是与中国固有文化主要是儒、道思想相磨合；三是善于创新，如慧远、僧肇、道生等人的著作、南北朝的众多学派，尤其是天台、华严、净土、禅宗诸派，都是中国佛教创造的典范。二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发展史表明，善于处理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佛教与固有文化的关系，以及佛教自身的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三个动力。凡是处理好三个关系的时期，中国佛教就获得发展，反之，中国佛教的发展就遇到障碍，就停滞不前。就上述三项经验的第二项来说，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磨合，二千年来，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就是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磨合的过程，内容丰富多彩。总结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磨合的过程、内容、经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就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探讨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内核、精神的关键环节之一。研究儒、道、佛三教的关系是重要的，也是困难的，因为这种研究起码需要具备儒、道、佛三方面的知识，就中国学者来说，具备佛教知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由于知识结构缺陷等原因，在我国系统、深入、全面地研究儒、道、佛三教交涉史的专著尚未问世，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以为，凡有志于专攻中国文化的青年学者，涉猎佛教的基本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若能深入研究佛教则更为可嘉，而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也自可预期也。

彭自强君为人忠厚谦和，好学上进。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期间潜心学业，勤奋刻苦。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规定了这样的写作任务：按照历史发展先后顺序，力图通过梳理佛教传入中国后早期发展阶段与儒、道交涉的事实，明了佛教由完全依附于儒、道到逐步自主地吸收与利用儒、道的演变过程，以说明佛教在这一过程中既吸收与利用儒、道的相关思想因素，又竭力保持自身内在思想和外在特征的独特性格，以及汉魏两晋时期儒、道、佛三家互动互补的文化交流规律。

彭氏在论著中运用解释学和比较学的方法，对汉魏两晋时期

儒、道、佛三教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内容、特点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在阐述佛教般若学和魏晋玄学的交融时，彭氏特别提出了“格义”和“得意”的关系，并作了富有新意的解说。论著还就我国早期佛教的著名高僧、重要译著，以及三教交涉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评述，并提出这样的论点：佛教对道家、道教从依附到区别二者，用道家斥道教，对儒家则是从引入伦理观念到确定儒、佛同旨、内外有别的关系定位。凡此论述，都是有见地的。

彭自强在京三年，与我互结善缘，建立师生情谊，这也是弥足珍贵的。

方立天

2000年5月20日序于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引 言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佛三家的交融互补为基本内容。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大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道（包括道家和道教）、佛两家处于一种辅助的地位。儒、道、佛三家由于相互之间在思想内核、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发生抵牾乃至冲突，相互指责与攻击对方的不足或缺陷，同时又通过吸取对方的相关因素来调整、充实自身的思想内容。三家思想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儒、道、佛三家的冲突与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保持常变常新的态势。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临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本土思想文化的迎拒。儒、道对佛教的排斥、同化与利用，佛教对儒、道的依附、抗衡与渗透，构成了佛教与儒、道关系的主要内容，贯穿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之中。汤用彤先生在论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思想文化的交流时，认为大致要经过这样三个阶段，即在交流的开始阶段，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多，“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随着交流的进行，各自的

特点逐渐表现出来，“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在交流的第三个阶段，由于相互间的深入了解，不仅看到不同之处，而且还看到了实质上的相同之处，在更高的层次上，“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与儒、道的关系也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直到东晋时期，佛教在总体上对儒、道处于依附的状态。在汉代，佛教在宗教观念上依附于神仙方术，在政治伦理观念上迎合儒家；在魏晋时期，佛教在思想内容和方法上着重依附玄学，在内容上更加充实，并逐渐扩大流传，从而又反过来对玄学产生影响。从东晋开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儒、道处于一种抗衡的状态。由于佛教自身的极大发展，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的特点越来越充分地显露出来，佛教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在范围和程度上也越来越宽广和深入，这使得儒、道对佛教采取一种相对激烈的争斗姿态；佛教自身的发展也使其有实力与之抗衡，同时在这种相对激烈的冲突过程中，佛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三方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各自的特点及其作用，相互吸取对方思想中的相关因素以使自身得以充实和完善，三教融合、三教一致日益成为儒、道、佛三教关系的主流。佛教融合儒、道的直接表现就是在摄取儒、道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佛教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及禅宗等。同时佛教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也为儒、道所借鉴和吸收，最突出的就是宋明理学对佛教的融会。宋明理学的建立，也标志着佛教与中国

^① 参见汤用彤著《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第7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

传统文化的融合的成功。

佛教经过长期与儒、道之间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由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最终彻底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在吸取儒、道两家相关因子的同时，又保持了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儒、道两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地吸收了佛教文化的成果，成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儒、道，但儒、道仍然是儒、道，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独立性。

因此，对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对深入确切地理解与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总结这一过程本身所包含的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交流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和规律，对于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文化建设也具有启示与借鉴的作用。

本文以汉魏两晋时期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历史的先后顺序，力图通过梳理佛教传入中国后早期发展阶段与儒、道关系的事实，明了佛教由完全依附于儒、道到逐步自主地吸收与利用儒、道的变化，以说明佛教在这一过程中既吸收与利用儒、道的相关思想因素，又竭力保持自身内在思想与外在特征的独立性的特点，以及汉魏两晋时期儒、道、佛三家互动的规律。全文共分七章，各章写作的意图、理路和大意如下：

第一章从汉代一般人对佛教的理解和佛教界自身对佛教的理解两个方面来说明汉代佛教对儒、道的完全依附。指出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初期，一般人将佛教视同神仙方术，佛教界自身不仅认同这种理解，而且同样也是以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来理解与宣传佛教的。

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安世高和支谶所译佛经中几个概念的分析以及对康僧会佛教思想的归纳，以说明佛教独立性的初步体现。其中对安世高译经中的“五阴”、“非身”观念和支谶译经中的“本无”、“自然”观念的分析表明佛教不仅仍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佛教对道家思想由被动依附到初步主动吸收的变化；康僧会的佛教思想所呈现出来的特色又表明儒家思想对佛教的极大影响。

第三章是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的交融的上半部分，着重理清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相互交融的主要线索。首先对佛教的“格义”与“得意”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界定与分析，认为般若学由“格义”到“得意”的转变代表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由表面的字句比配到力图系统融会的过程，“六家七宗”的出现是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言意之辩”作为玄学的重要内容和方法论思想，对般若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般若学实现由“格义”到“得意”的转变的枢纽。其次对“六家七宗”中代表性的三家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的思想特点以及僧肇《不真空论》的思想内容及其意义进行了分析与阐释，认为从“六家七宗”到《不真空论》，表明般若学的思想内容与方法由主客分离到即体即用的发展。

第四章是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的交融的下半部分，通过对魏晋名士中的两个代表人物孙绰与郗超调和儒佛、儒佛同一思想的分析，以展示世俗人士对佛教理论及其社会作用的理解，也表明玄学与佛学、名士与名僧的密切联系。

第五章以“老子化胡”说为个案，对道教的“老子化胡”说和《老子化胡经》的由来及其内容，以及佛教对之进行回应的

“三圣东行”说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从佛教对“老子化胡”说由接受到反对这种态度上的转变，表明了佛教势力的增长，同时这也是尔后“夷夏之争”的滥觞。

第六章以东晋时期两次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为主要内容，在分别介绍了庾冰与何充、桓玄与王谧之间论争的观点之后，着重分析了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内容及其意义。认为这两次论争具有思想上的逻辑联系，论争的实质是佛教与儒家礼法的冲突与妥协，慧远有关沙门不敬王者的思想是这次论争的理论成果，他对佛教的社会作用的论述及其对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定位的观点，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第七章以因果报应与形神生死两方面的论争为主要内容，在反佛论者一方着重介绍了戴逵以及桓玄等人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善恶报应论和命定论是他们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论的主要理论依据；通过对慧远因果报应论和形尽神不灭论的内容及其论证的分析，表明慧远的有关理论既结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因素，又具有印度佛教相关思想的影响，他的因果报应论和形尽神不灭论是佛教中国化在理论上的重要成果。

结语部分对本时期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过程进行了概括，对本时期佛教与儒、道之间关系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需要说明的几点是：

第一，本文在时段划分上以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到东晋慧远结束，主要原因是认为这一时期作为佛教与儒、道冲突与融合过程的早期阶段，该阶段佛教与儒、道冲突与融合的史实在事实层面和思想层面均具有源头性的意义。例如《理惑论》中就包含了后来三教之争与三教融合内容的几乎所有方面，尽管理论深度

有所不足，然而可以说后来的论争是对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深化；慧远的佛学思想是中国化佛教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佛教独立自主地融合儒、道思想的初步体现，因此将慧远及其有关思想作为本时期佛教与儒、道冲突与融合过程的终结和总结。

第二，本文在论及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时，主要涉及思想层面的内容，注意思想上的逻辑联系，以力求理清本时期佛教与儒、道冲突与融合的主要线索。因此，对于佛教与儒、道冲突与融合这一过程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及其在民间习俗中的表现等内容，由于论题的限制以及笔者学力不逮，只好暂付阙如，留待将来再予以补充。当然，所谓理清本时期佛教与儒、道之间冲突与融合的主要线索，也只是笔者主观上想要达到的目的，学养所限，对于所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在本时期佛、儒、道关系中的深层意义，笔者只能在自认为解释清楚材料本来意思的基础上尽力而为，这方面的不足也有待于将来弥补。

第三，本文直接论及佛教与道教之争的内容只有关于“老子化胡”说一章，这是由于笔者认为汉代佛教与道教发生关系时，佛教初入中土，几乎完全被视同于神仙方术，佛教也主动依附于道家与道教，二者之间从总体上说不存在论争；汉末以后道教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抑制，主要流行于民间，而佛教在这一阶段却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直接发生论争的机会不多；佛教与道教真正激烈的论争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因此本文将“老子化胡”之争作为本时期佛教与道教之争的主要内容。

最后，交待一下本文的引文、注释内容和参考书目：1、引文涉及佛典的一般据《大正藏》，若有善本及权威标点本则另从之，文字的句读根据文义有可能与引用本不尽相同，因其量大，